

中正漢學研究

專輯：近世意象與文化轉型 III：
跨域想像及典範遞轉

二〇一三年第二期（總第二十二期）

Chung Cheng Chinese Studies

*Feature Articles Modern Image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II：
Boundary-Crossing Imagination and the Shifting of Paradigm*

清順治京師詩壇之盛世話語： 以北籍仕清文人爲考察

王 學 玲

· 抽 印 本 ·

臺灣・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出版

清順治京師詩壇之盛世話語： 以北籍仕清文人為考察

王學玲*

摘 要

順治年間，京師聚集了大批歷經世變而後仕於清的北籍文人，他們高居顯職，出入廟堂，從事各項文藝活動，深具影響力。本文專論這一批文人的雅正詩學主張。先從晚明談起，辨析晚明北地文人，論詩力主醇雅清和，乃為了矯正其時枯澹浮艷的詩風。次論北籍文人仕清之後，持續倡導合乎性情之正，復歸詩教風雅的真詩，順治年間的京師詩壇遂呈現雅正平和的盛世之音，溫柔敦厚的詩教也被賦予新義。同時，北籍仕清文人轉以書寫主體為重心，提出詩的體格、聲音才是鑑別正變的準則，使得詩風與世風脫鉤，詩歌風雅和時代盛衰不再休戚相關。而無論從書寫主體或詩歌本身，北籍仕清文人論詩總不離雅道，作詩必須合乎溫柔敦厚。最後，北籍仕清文人的風雅詩教，開創性或許有限，卻呼應了新王朝開創盛世的文治要求，並且彰顯順治與康熙二朝之間京師醇雅詩風的關聯。

關鍵詞：順治詩壇、盛世話語、風雅、正變、北籍仕清文人

* 臺灣暨南國際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從世變嗔怒到春雅盛音的易代研究視域

很長一段時間，關於明末清初文人的探析多集中在不肯與滿人妥協的易代遺民。他們或奔走糾眾，圖謀復明；或絕意仕進，閉戶隱遁，對於鼎革之際的文學、文化，貢獻厥偉，影響深厚，學界對此論著頗多且析解精當，形成易代研究的豐碩現況。然則，既存的詮釋話語，某種程度又可能限制了論題發展，側重易代遺民，難免會忽略其他群體，並將遺民極為重視的出處大節視為研究預設。自然地，與遺民進退迥異的仕清文人鮮少被討論。至於江左三大家—錢謙益（1582-1664）、吳偉業（1609-1672）與龔鼎孳（1615-1673），雖然較受到學者關注，卻多從遺民群體所認同的道德敘述，析究改仕異朝後，此三人在作品中所呈現的悲悔情志。¹

邇來，此種現象逐步產生轉變。馬大勇從由明入清的貳臣詩人，談到康熙初中期的「金台十子」，肯定以「江左三大家」為標志的貳臣詩群帶有明顯的多元傾向，其中「燕台七子」、「海內八家」這批第一代台閣詩人漸趨「國朝化」，呈現「雅音」與「個體意識」的綜合特色。²白一瑾專論清初貳臣群體，特別標舉其「從黍離變雅到廟堂正雅」的詩歌風格演化，具有承上啟下的文學地位。³張立敏則以博學鴻詞科前後為察考，析剖康熙十七年至二十一年馮溥（1609-1691）在京師的社會活動與詩歌演變，說明雅正詩風如何逐漸演化為康熙盛世主導的風格。⁴以上幾部著作，均專論歷經世變的仕清文人群體，同時觸及入仕新朝後，其詩歌中所展現的盛世雅音。

康熙朝詩風隨世運移，進入「醇雅」、「正宗」的新時代，嚴迪昌先生已持此說。其考辨王士禎主盟京師詩界的時間，及其倡導「神韻說」之形成過程，判定王士禎倡導的神韻醇雅詩風，康熙二十年（1680）以前即已暢行於京師。⁵張立敏認為康熙即位之初，朝綱

¹ 相關論述如蔣寅：〈懺悔與淡忘：明清之際的貳臣人格〉，《徐州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2012），頁55-67、張永剛：《明末清初黨爭視閥下的錢謙益文學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伍福美：《吳梅村詩歌藝術新論》（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王于飛：《吳梅村生平創作考論》（重慶：重慶出版社，2003）、嚴迪昌：〈金臺風雅總詩人——龔鼎孳論〉，《語文知識》第1期（2008），頁4-7、劉麗：〈失路之悲，故國之思——龔鼎孳詩歌發微〉，《咸陽師範學院學報》第3期（2007），頁93-96。嚴志雄

² 馬大勇〈餘論〉，氏著：《清初廟堂詩歌集群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頁216。

³ 白一瑾〈從黍離變雅到廟堂正雅——清初貳臣創作風格的演化〉，氏著：《清初貳臣士人心態與文學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頁415-429。

⁴ 張立敏，〈緒論〉，氏著：《馮溥與康熙京師詩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頁16-21。

⁵ 嚴先生於「王士禎主盟詩界的時間考辨」一節，詳細考辨康熙十八年京師與海內詩壇耆舊的凋零情狀，「燕台七子」、「金台十子」等文人群體的活動狀態，從而認為康熙十六年王士禎於京邸親定《十子詩略》是其主盟京師詩壇的一個先期徵兆。康熙十八年三月「博學鴻詞」，天下才彥雲集京師，詩文壇恰值群龍無首，權威空缺。王士禎被任命為國子盛祭酒，並在此前一再得御賜「存誠」、「清慎勤格物」以及御筆〈楓橋〉詩幅等，恩寵有加，位漸隆尊。就在天時、地利、人和三者最佳契合點臨降，王士禎遂於康熙十九年登上詩壇盟主。嚴迪昌：《清詩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頁

以鰲拜為首的四大臣掌控，仍循世祖舊制。重視文治是康熙八年親政後之事。康熙十五、六（1676、1677）年間，京師詩壇盛行王士禛所主的「宋調」，與康熙個人的詩歌審美趣味相違背，「作為文治產物神韻詩風的出現及流行乃是此後詩壇的境況。」⁶易言之，神韻說所掀起的雅正詩風，應遲至康熙十七年（1678），博學鴻詞科之後才出現。

二位學者都認為京師盛行醇雅詩風發生在康熙年間。至於馬大勇所云詩風漸趨雅音的「燕台七子」和「海內八大家」，分別得名於順治十八年（1661）刻行的《燕台七子詩刻》和康熙十年（1671），王士禛策劃，吳之振纂輯之《八家詩選》。⁷依馬氏之見，詩歌中的盛世雅音在《燕台七子詩刻》刻行的順治末年已露端倪。白一瑾也提及此現象，並將清初貳臣群體分成三梯次，認為第三梯次的貳臣士人，入清時年紀較輕，閱歷較淺，精神上已近乎完全轉型為清王朝的忠實臣子，故詩風中的變雅之音更少，廟堂大雅風範更為純粹，而這批文人幾乎活躍於順治京師詩界。⁸此外，專論康熙詩壇的張立敏，亦察見馮溥在順治十一年（1654）任國子監祭酒時，即按期課士，親閱試卷，務使學術歸於純正。⁹凡此可見，康熙京師詩界所暢行的醇雅之音，順治詩壇也曾出現。本文冀能擴展並深化以上諸位學者論述，追溯詩學觀念的演化，以顯順治時期京師詩壇盛世話語之內涵。

據統計，明清世變時或先附李自成後降清、或在北京降於多爾袞、或在地方投誠，接受赦免、或順治以後荐至北京的明朝漢官，以北人居多。¹⁰仕清之南方文人，常熟錢謙益於順治三年（1646）託病回鄉。嘉興曹溶（1613-1685）先附李自成，後降清。順治四年（1647）因失職而被革職回籍，十年（1653）方補原官進京，隨即又於十二年（1655）補廣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再度離京，康熙朝方返京師。¹¹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合肥龔鼎孳（1615-1673），也是先後歸順李自成與大清，順治三年因父喪南歸，九年「守制服闋回京補館卿」，此後一再被降職調用，十三年「奉使頒詔粵東」，十五年回京後，仍處罰俸降職之境。¹²其餘在京師的南人，如陳名夏（1601-1654）、陳之遴（1605-1666）、金之俊（?-1670），相較之下，遠不如高居顯職的北人出入朝堂，從事各項文藝活動，甚具影響力，這是本文專論京師北籍仕清文人的原因。依季六奇《明季北略》所列「從逆諸臣」看來，在前明或

449-456。

⁶ 張立敏：《馮溥與康熙京師詩壇》，同註4，頁12-13。

⁷ 馬大勇：《清初廟堂詩歌集群研究》，同註2，頁117-118。

⁸ 白一瑾：《清初貳臣士人心態與文學研究》，同註3，頁417-418、427-428。

⁹ 張立敏：《馮溥與康熙京師詩壇》，同註4，頁96。

¹⁰ 詳參魏斐德著、陳蘇鎮、薄小瑩等譯：《洪業—清朝開國史》（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5），頁312-315。

¹¹ 曹溶經歷詳參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78〈貳臣傳甲〉，頁6491-6493。曹秀蘭〈曹溶年譜簡編及部分詞作編年〉，氏著：《曹溶詞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

¹² 龔鼎孳經歷詳參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同上註，卷79〈貳臣傳乙〉，頁6593-6595。董遷：《龔芝麓年譜》，收入《年譜叢書》（台北：廣文書局，1971），第5冊。

已取功名，或任職官員，入清後仍居要職的北地文人多集中在北直隸（北京）、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陝西等地，¹³故本文所指北籍仕清文人主要來自以上諸省。

若就出處觀之，極易判定仕清文人主張詩風醇雅，與其政治立場相關，甚至刻意迎合統治者的昇平宣言。事實上，北籍仕清文人論詩以醇雅清和為主，乃延續晚明以降北地傳統，為了矯正其時枯澹浮艷的詩風，故本文於第二節先梳理之。仕清後，北籍文人在京城持續倡導合乎性情之正，復歸詩教風雅的真詩。清初遂呈現盛世正雅與亡國嗔怒的迥異正變觀，溫柔敦厚的概念也被賦予新義，於第三節詳述。同時，北籍仕清文人轉以書寫主體為重心，提出詩的體格、聲音方為鑑別正變的準則，使得詩風與世風脫鉤，詩歌風雅和時代盛衰不再休戚相關。而無論從書寫主體或詩體本身，北籍仕清文人論詩總不離雅道，作詩必須合乎溫柔敦厚，此乃第四節論述要旨。最後，北籍仕清文人的風雅詩教，開創性或許有限，卻呼應了新王朝開創盛世的文治要求，並且彰顯順治與康熙二朝之間京師醇雅詩風的關聯。

二、跨越世變的詩學論題：矯正晚明枯澹浮艷之弊

檢討晚明詩壇流弊，提出修正之道，是清初詩學的重要課題之一，北籍文人同樣參與其間。其中河南孟津王鐸（1592-1652）宗法前後七子，倡導復古風雅，在順治年間的京師詩壇造成迴響。¹⁴事實上，崇禎時，王鐸與南方友人論詩，已主張以復古匡救詩風弊病：

同時有石齋、鴻寶、太青、明卿、牧齋諸鉅公偕聲唱和，共救四體八病之失，大振嚆殺纖瑣之弊。（王鐸〈擬山園選集序〉）¹⁵

午後風沙，不能出，適王覺斯來，予出舟中詩求金針之度，覺斯因抵掌談詩，必以得風雅性情之正，其於唐也，先杜後李，以王摩詰鼎峙其間，明取李崆峒而大貶徐鍾。（《祁忠敏公日記·涉北程言》）¹⁶

覺斯言，詩大概取神理具足，既昨所言得性情之正，至於淡濃平奇，在人各出手眼，要以不詭於正宗耳。（《祁忠敏公日記·涉北程言》）¹⁷

¹³ 李六奇：《明季北略》（北京：中華書局，2006），下冊，卷之22，頁598-641。

¹⁴ 馬大勇：《清初廟堂詩歌集群研究》，同註2，頁76-80。

¹⁵ 王鐸〈擬山園選集序〉，見〔清〕王鐸：《擬山園選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十年（1653）王鐸刻本，2000），集部，第87冊，頁125。

¹⁶ 〔明〕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頁9，收入李德龍、俞冰主編：《歷代日記叢鈔》（北京：學苑出版社，2008，民國二十六年紹興縣修志委員會鉛印本），第7冊，頁83-84。

¹⁷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頁11，《歷代日記叢鈔》，同上註，頁86-87。

石齋為福建漳浦黃道周（1585-1646）、鴻寶是浙江上虞倪元璐（1593-1644）。王鐸與二人皆於天啟二年（1622）選庶吉士，「惟王覺斯、倪鴻寶與我（按黃道周）最乳合，盟肝膽，孚意氣，砥礪廉隅，又棲止同筆，研為文章。」¹⁸同年中，與王鐸關係較為密切者還有文震孟（1574-1636）、祁彪佳（1602-1645）。崇禎四年（1631），王鐸與祁彪佳於京師會面，二人時常酌飲論詩，後二則引文分別是十月十九日與十一月初五。

明弘治、嘉靖年間，前後七子倡言復古，標舉盛唐典範，力廓台閣體的堆砌，茶陵派的萎弱，惜末流墮入摹擬，徒具聲律形式。公安三袁強調獨抒性靈，竟陵則轉入幽深孤峭。此二派反對擬古的同時，形成尖巧細碎的現象，撻伐之聲四起，北方文士亦多不滿。山左萊陽宋玫（1607-1643）、姜埰（1607-1673）、姜垓（1614-1663）等人與江南應社、松江几社，遙通聲息，「倡導詩以用世，反對公安派適意之詩，排斥竟陵幽峭之詩，宣揚雄渾雅正。」¹⁹天啟二年，王鐸年方三十一，已具體糾舉晚明詩風「四體八病」、「噍殺纖瑣」的弊失。時隔十年，王鐸仍感不滿，甚至向好友祁彪佳提出取法李夢陽之宗唐，論詩「必以得風雅性情之正」的金針密法。

王鐸不僅與南方文人多有往來，並於天啟七年（1627）任福建考試官，崇禎八年（1635）掌南京翰林院事，崇禎十三年（1640）任南京禮部尚書，²⁰北地之外的詩學思潮，他應該不陌生。況且晚明公安、竟陵之說一時風靡南北，更加深王鐸擔憂風雅一道無存，故云，「今之言詩者曰：『里巷女戎之詩皆自然明白者也。』古則害氣害調，創者害韻害清。嗚呼！柔曼嬋媛之音，吹角叩瓦已矣！」²¹「詩人趨《詩歸》，呷醋舐酸，氣弱甲齡，風雅一道，板蕩堪悲。崆峒以後，僕以為國寶若盡耳。」²²²³基於此，王鐸廓清頹靡詩風不遺餘力，彭而述（1605-1665）〈胡德輝先生詩序〉：「吾鄉王孟津當年嘗感風氣之靡，與余矢心共挽，海內有力之士間有所孤奮，以自標置於世，駸駸乎丕變矣。」

24

¹⁸ 黃道周〈擬山園選集序〉，〔清〕王鐸：《擬山園選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同註15，集部，第87冊，頁115。

¹⁹ 李聖華：《晚明詩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頁235-236。

²⁰ 王鐸經歷詳參張升：《王鐸年譜》（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7），頁59、87、117。

²¹ 王鐸〈巾蓮齋詩序〉，《擬山園選集》，卷30，頁6，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同註15，集部，第87冊，頁462。

²² 王鐸〈答太沖〉，《擬山園選集》，卷53，頁3，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同註15，集部，第88冊，頁35。

²³ 王鐸詩學思想及其對於明清之際詩學的影響，詳參扈耕田：〈嗣響七子，熔鑄眾長—王鐸詩學思想簡論〉，《洛陽大學學報》第19卷第1期（2004），頁38-41、黃玉琰：〈王鐸與明清之際的詩學思潮〉，《名作欣賞》第8期（2011），頁105-108、張以國：〈王鐸的理論與晚明的文藝思潮〉，《東方藝術》第16期（2012），頁6-37。

²⁴ 〔清〕彭而述，《讀史亭文集》，卷3，頁8，收入《四庫全書目叢書》（台南：莊嚴出版社，1997，河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彭始搏刻本），集部，別集，第201冊，頁42。

除了王鐸，順治京師以詩名者，尚有山東安丘劉正宗（1594-1661）與河南孟津薛所蘊（?-1667），時稱「三大家」。²⁵劉正宗，號憲石，山東安丘人，明崇禎元年（1628）進士。順治二年，奏薦起授國史院編修，歷弘文院侍讀學士、太子太傅等職。順治十七年（1660），「革職追奪誥命，籍家產一半歸入旗下，不許回籍。」十八年（1661年）病逝。²⁶薛所蘊，號行屋，河南孟縣人，明崇禎元年進士，入清官至禮部左侍郎。順治十四年（1657），御史高爾儼（1605-1654）劾其年老，每會議渺無識見，宜引退，原品休致。康熙六年卒。²⁷劉正宗與薛所蘊為同年進士。王鐸和薛所蘊有同鄉之誼，劉正宗則透過薛所蘊結識了王鐸，三人在清初京師聲氣相應，相互援引。²⁸

薛所蘊《澹友軒文集》刊於順治十六年（1659），據其〈曹錫餘詩序〉：「憲石先生與余共相切磋者二十餘年，論詩必先格調，通之性情，期於近法李唐，以遠追三百篇遺音，務使言有盡而意無窮，斯非苟作者。」²⁹二人論詩既達二十餘年，則復唐音，追三百篇之立論亦當溯及晚明。依薛所蘊所憶，他和劉正宗均附和王鐸看法，對於枯澹浮艷的晚明習氣不以為然，主張回歸風雅之正：

惟是風雅一事共靡切，傷時趨之詭正也，競為新聲，以枯澹為清脫，以浮艷為富麗，咀之無餘意，諷之無餘音，均于風雅無當也……予曰：「詩自宋元迨明初而不振實甚，李獻吉、何仲默崛起而還之古。自後七子互為鼓吹，而滄溟赤幟子子海內大將之壇。仲默，吾中州人，獻吉雖系籍慶陽，實生長大梁，亦吾中州人，滄溟山左，則憲石同里。今競為新聲者，枯澹浮艷之習中于人心，非以氣格矯之不能返于正而歸于風雅。覺斯先生大昌明此，指其為空同有餘，予固不敢望信陽；憲石集出，其于歷下何多讓焉？」（薛所蘊〈劉憲石逋齋詩序〉）

30

近代以來，自北地信陽，吳門歷下諸公，力變宋元衰習而還之古學者，宗之其敝也，流而為襲。竟陵以清脫矯之，其細已甚，失則薄；雲間諸賢乃欲以藻麗

²⁵ 彭志古〈梓庵詩跋〉：「長安以詩名者，為王先生覺斯、劉先生憲石，暨吾行屋薛夫子，所謂三大家也。」〔清〕薛所蘊：《梓庵詩》，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清順治刻本），第14冊，頁648。

²⁶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同註11，卷79〈貳臣傳〉，頁6572-6574。

²⁷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同註11，卷79〈貳臣傳乙〉，頁6659-6660。

²⁸ 王鐸、薛所蘊、劉正宗三人之交游，參見范秀君：〈清初「中州三大家」劉正宗、薛所蘊及王鐸交游考論〉，《蘭台世界》第2期（2013），頁137-138。

²⁹ 〔清〕薛所蘊：《澹友軒文集》，卷之3，頁18，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清順治刻本），第15冊，頁49。

³⁰ 《澹友軒文集》，卷之3，頁14，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同上註，第15冊，頁41。

勝，失則艷。薄者格律卑弱，晚唐人之餘涎，艷亦齊梁之後塵也。（薛所蘊〈沈繹堂釣臺集序〉）³¹

「覺斯先生大昌明此，指其為空同有餘，予固不敢望信陽；憲石集出，其于歷下何多讓焉」，薛所蘊將王鐸、劉正宗、自己，分別比擬李夢陽（1473-1530，號空同子）、李攀龍（1517-1570，號滄溟，山東歷城人，與劉正宗同里）與何景明（1483-1521，字仲默，河南信陽人）三位北地文人，不僅有意識應和他們「歸于風雅」的詩學觀念，同時具有強烈的地域意識，宣揚北地的文學傳統。³²薛所蘊此論，乃基於不滿意晚明競為「以枯澹為清脫，以浮艷為富麗」的新聲時尚。然而，薛所蘊不只對於竟陵派纖薄之弊有意見，其對雲間諸子步齊梁後塵的藻艷現象也不欣賞。

晚明雲間陳子龍（1608-1647）不滿竟陵楚風，紹承北地七子，重張「雅樂」的詩學主張，與王鐸、薛所蘊等人相類。不同的是，陳子龍等人並不排斥藻麗的艷情之作，仍視為大雅之聲，無累於詩人品德，³³薛所蘊糾舉雲間「以藻麗勝，失則艷」實緣於此。陳子龍處於晚明衰變，卻要求詩人情感合乎儒家詩教，作雅正平和之音，希望藉由詩風扭轉世風，導正社會、政治復歸盛世，所謂雅正詩篇實已兼具文學審美與社會功能的雙重意義。³⁴但陳子龍無法規避身在亂世的事實，因此同時認同變風變雅，不平和之音的合理性。此種肯定變風變雅的詩學觀念，在晚明詩壇並沒有產生多大影響，³⁵反倒是王鐸與薛所蘊提倡：「必以得風雅性情之正」、「返于正而歸于風雅」的思潮居於主流。

入清後，詩界崇正抑變的現象有了消長轉變，對於家國傾覆的遺民文人而言，天崩地坼的世變遭遇，嗔怒的變風變雅方能如實展現性情。甚至，嗔怒成為一種抵抗不合法政權的書寫策略，倘若呈現溫柔溫厚之風，豈不間接承認盛世正音，認同大清此一異族統治？相對地，新王朝要有開國氣象及與之相應的治世之音，自然地採納傳統詩教的社會功能，提供建構盛世政治的依據。因此，「正變與溫厚和平的問題在清初的詩學中絕不是一個純粹的詩學問題，而是一個非常現實的政治問題。」³⁶既是外在政教的現實需求，又為內在詩觀的自然演化，順治年間在京師的詩學討論是以須要進一步梳理、辨析。

³¹ 《澹友軒文集》，卷之3，頁14，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同註29，第15冊，頁47。

³² 白一瑾：〈北方「正統」與江南「變體」——論明七子在清初傳承的兩條主線〉，《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6卷第6期（2010），頁180-183。

³³ 謝明陽：《雲間詩派的詩學發展與流行》（台北：大安出版社，2010），頁83。

³⁴ 詳參謝明陽：《雲間詩派的詩學發展與流行》，同上註，頁112-121。

³⁵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29。

³⁶ 同上註，頁26。

三、詩教風雅：真詩乃得性情之正

清初江南文人仍有主張醇雅敦厚的詩風，繼承陳子龍的「西冷十子」即為其一。收錄陸圻（1614-?）、丁澎（1622-1686）、柴紹炳（1619-1670）、毛先舒（1620-1688）等人的《西陵十子詩選》刻於順治七年（1650）。³⁷十子多居於江南，入清後幾乎隱逸，少數如丁澎為官卻仕途坎坷，即便力主詩教風雅，影響也極為有限。相反地，北籍仕清文人尊崇七子，以宗唐為家法，其所倡導的詩教風雅在京師詩界蔚為風尚：

（劉正宗）今海內士大夫鼓吹休明，振起風雅，泐泐乎欲比隆唐人，而樹幟登壇，執此道牛耳者，咸首推相國憲石先生。（薛所蘊〈曹錫餘詩序〉）³⁸

（白謙胤）詩多得之政事之餘，黼黻鴻猷，鼓吹大雅。（王崇簡〈東谷集序〉）³⁹

（王崇簡）唐音不絕，中正和雅，無邪氛雜其筆端。（陳融《顯園詩話》）⁴⁰

（孫廷銓）文筆雖未能與一時作者抗衡，而平正通達，究無纖仄嚙殺之音，蓋時會之盛為之也。（《四庫全書總目》）⁴¹

（梁清標）詩作於明季者，意多感諷，至順治朝，則音節春容。（徐世昌《晚清詩話》）⁴²

順治五年（1648），清人對於京師內外空間重新分配，內城盡歸八旗，漢族官員及商、民等盡徙南城居住。對在京漢官而言，外城成為居住和活動的主要空間，劉正宗之漣齋、薛所蘊之桴庵、王崇簡（1602-1678）之青箱堂及丁耀亢（1599-1669）的陸舫齋均在此區域，經常聚集許多北籍漢官。⁴³他們大多為舊識，往來宴飲賦歌、唱和述情。比方順治五年到十一年居留北京的丁耀亢，其《陸舫詩草》分別由王鐸、劉正宗、薛所蘊、河南新鄉張縉彥（1599-1670）與山東淄川高珩（1612-1697）所鑒定，集中更收錄不少集體出遊、

³⁷ 同上註，頁30。

³⁸ [清]薛所蘊：《澹友軒文集》，卷之3，頁18，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同註29，第15冊，頁49。

³⁹ 王崇簡〈序〉，見[清]白胤謙：《東谷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清順治刻康熙續刻雍正補刻本），第22冊，頁125。

⁴⁰ 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順治朝」，頁1640。

⁴¹ 《清詩紀事》，同上註，「順治朝」，頁1594。

⁴² 徐世昌：《晚清詩話》（上海：華東大學出版社，2009），卷22，頁101。

⁴³ 王成蘭：〈清初京師漢官的生活空間和關係網絡——以陳名夏和劉正宗為個案〉，《江海學刊》第6期（2007），頁144-149。

彼此唱和之詩。除了以上諸位,《陸舫詩草》還經常出現北直隸真定傅維麟(?-1666)、順天大興孫承澤(1593-1676)、王崇簡等北地文人。⁴⁴順天宛平王崇簡《青箱堂詩集》中有王鐸之序,⁴⁵王崇簡在順治十八年秋為山西陽城白胤謙《東谷集》撰序,⁴⁶白胤謙則在順治十七年夏為北直隸真定梁清標《蕉林詩集》寫序。⁴⁷可見順治年間在京城北籍文人多彼此熟識,時有往來,形成緊密的交際網絡。依薛所蘊之言,劉正宗是王鐸以外,京師詩界中另一位執牛耳者。張縉彥(1599-1670)亦云:「劉學士憲石先生……海內一時能詩者心折學士,推為齊盟。」⁴⁸劉正宗以詩噪海內,令學士心折之姿,「鼓吹休明,振起風雅」,其影響力可想而知。薛所蘊本人也力振詩教醇風,⁴⁹其他如王崇簡詩「中正和雅」、白胤謙詩「不失雅正」、孫廷銓詩「平正通達」、梁清標詩「音節春容」。可見順治年間京師匯聚著一批詩風雅正的北籍文人,他們由明入清,持續宣揚「必不屑逐纖縟以傷大雅」⁵⁰的詩觀。

遺民群體力主怒嗔衰鳴,北籍仕清文人倡導風雅正音,正變詩學一再被重提、析辯,其所形成之不同見解,留待下節詳釋。隨著風雅論述而來的是「性情」之探究,北籍仕清文人大都肯定詩為性情之發抒,張縉彥:「詩以道性情也」、⁵¹薛所蘊:「六經皆古人自抒其所得之作,而詩三百篇尤為性情之書」。⁵²山東益都趙進美(1620-1692):「詩者,古人自言其性情而已」。⁵³詩本性情是清初詩學語境的共識,差異在於性情內涵之界定,北籍仕清文人幾乎肯定王鐸在崇禎四年與祁彪佳之論詩觀點,推崇「性情之正」的風雅詩教:

覺斯言,詩大概取神理具足,既昨所言得性情之正,至於淡濃平奇,在人各出

⁴⁴ 丁耀亢:《陸舫詩草》,見〔清〕丁耀亢撰、張清吉校點:《丁耀亢全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上冊,頁7-213。

⁴⁵ 王鐸〈序〉,見〔清〕王崇簡:《青箱堂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清康熙二十八年王燕重刻本),第16冊,頁304。

⁴⁶ 王崇簡〈序〉,見〔清〕白胤謙:《東谷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同註32,第22冊,頁124-126。

⁴⁷ 白胤謙〈蕉林詩集序〉,見〔清〕梁清標:《蕉林詩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出版社,1997,南開大學圖書館清康熙十七年梁元植刻本),集部,別集,第204冊,頁4-5。

⁴⁸ 張縉彥〈逋齋詩敘〉,見〔清〕劉正宗:《逋齋詩》,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清順治刻本),第8輯,第16冊,頁194。

⁴⁹ 胡世安〈燕箋詩集序〉:「士無不能文而文心駿,亦無不能詩而詩教衰,駿者醇之,衰者振之……吾李友憲石劉子,行鳩薛子,克暢振斯道也。」見〔清〕張縉彥:《燕箋詩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清順治刻本),第12冊,頁623。

⁵⁰ 劉正宗〈題燕箋序〉,見〔清〕張縉彥:《燕箋詩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同上註,第12冊,頁621。

⁵¹ 張縉彥〈憲石先生詩敘〉,〔清〕張縉彥:《依水園文集後集》,卷之1,頁33,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清順治旌德劉華宇刻本),第13冊,頁118。

⁵² 同註29,第15冊,頁44。

⁵³ 〔清〕趙進美:《清止閣集、止止文章》,收入《山東文獻集成》(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7,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初鈔本),第2輯,第29冊,頁728。

手眼，要以不詭于正宗耳。（《祁忠敏公日記·涉北程言》）⁵⁴

余嘗言，詩者，性情之正也。人心有動於性情，而後比物連類，宮和羽悲，各有以盡其致。（王崇簡〈宋秋士詩序〉）⁵⁵

古之風雅，其可以被管絃，歌庭廟，自王公大人之作，細至田野里巷之謳吟，皆足以動天地而感鬼神，雖百世之下，讀之者無不懽生舞蹈，悲起歎歔，凡皆自得性情之至而已。（王崇簡〈田髫淵詩序〉）⁵⁶

所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王崇簡重申〈詩大序〉中，風雅詩歌所具有的感染力，進而闡釋不管是野里風謠，或王公雅作，只要源自人心性情所動，「而後比物連類，宮和羽悲」，都會使讀者懽生舞蹈，悲起歎歔。易言之，讀者或生哀鳴之悲，或發雅和之音，均受到其所閱讀詩篇的牽動，詩之性情內涵的重要性即在於此。清初順治政局尚處動蕩，若能藉由文人風雅詩作，一來察考風俗、政教之得失；二則宣揚醇雅之音，以彰大清治世之盛，豈不兩全。恰巧，這正是王鐸等人所倡導的詩用，亦即詩歌的政教功能：

夫詩以察風俗，審王化，繫國家之盛衰……詩之和則一，一則多力兼利天下，何至淫詞靡靡肇亡，耳目毒亂也哉。（王鐸〈冷心芬詩序〉）⁵⁷

古者各國陳詩，王人採風謠而聽之，即以考列辟政教之得失，是古人之詩即古人之政……今天子神聖，日求閭閻疾苦而噢咻之。蒼恒詩出，紙貴都下一日者，聖主採而聽之……又淪淪乎大雅唐音也。噫！吾于蒼恒之詩夫亦愈知政矣。（薛所蘊〈胡蒼恒詩序〉）⁵⁸

今皇上方崇學，考訂雅音，以公等之人列在左右，賡和之作，洋洋著其盛，必使其傳之于後。（白胤謙〈蕉林詩集序〉）⁵⁹

「詩以察風俗，審王化」、「王人採風謠而聽之，即以考列辟政教之得失」，本就是「上

⁵⁴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頁11，《歷代日記叢鈔》，同註16，頁86-87。

⁵⁵ 〔清〕王崇簡：《青箱堂文集》，同註45，第16冊，頁10。

⁵⁶ 〔清〕王崇簡：《青箱堂文集》，同註45，第16冊，頁9。

⁵⁷ 〔清〕王鐸：《擬山園選集》，同註15，集部，第87冊，頁455-456。

⁵⁸ 《澹友軒文集》，卷之4，頁1-3，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同註29，第15冊，頁50-51。

⁵⁹ 《蕉林詩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同註47，集部，別集，第204冊，頁5。

以風化下」的詩教傳統。淫詞足以肇亡，毒亂耳目，也是歷代為政位者特重詩風之因。王鐸、薛所蘊等人高居要職，出入廟堂，倡導此論，一方面表明自己的風雅詩觀，另方面提供上位者推行文治之參酌。順治九年，吏科給事中高辛允即疏曰：「皇上親政之首科，允宜慎選庶常，以光聖治。臣等參考舊制，斟酌時宜，擇其年貌合格，文字雅醇者，允其選。」

60

現存梁清標《蕉林詩集》刻於康熙十七年（1678），但其中所收之白胤謙〈蕉林詩集序〉成於順治十七年（1660），⁶¹可見「今皇上方崇學，考訂雅音」指的是順治帝。順治八年，世祖親政，隔年八月，「幸太學，釋奠先師孔子」、並且勉勵太學師生篤守「聖人之道」、「講究服膺，用資治理」。⁶²後又敕曰：「聖人之道，如日中天，上賴之以致治，下習之以事君。」⁶³十二年三月壬子，世祖諭曰：「朕惟王敷治，文治是先，臣子致君，經術為本。自明末擾亂，日尋干戈，學問之道，闕焉未講。今天下漸定，朕將興文教，崇儒術，以開太平。」⁶⁴次日，又諭曰：「朕惟自古帝王，勤學圖治，必舉經筵日講，以資啟沃。今經筵已定於文華殿告成之日舉行，日講深有裨益，刻不宜緩。」⁶⁵世祖積極文治，在京漢臣應該看在眼底，也參與其間。如北直隸滄州戴明說〈李坦園先生序〉：「皇帝方崇聖教，修明經術」。⁶⁶又如北直隸柏鄉魏裔介（1616-1686）在順治十三年選編《觀始集》，順治十五年又有《唐詩清覽集》。究其用心，誠如魏裔介自云，「詩之為教，優柔敦厚，足以和人性情。故唐人謂，天子近臣不可以不親風雅。」⁶⁷

魏裔介在明朝並無功名，清順治三年方取進士，授工科給事中，屬入清後之新科進士。梁清標乃崇禎十六年進士，順治元年降清，尋授編修，累遷侍講學士，十年，任詹事府詹事，兼祕書院學士，同年，擢禮部侍郎。十二年，調吏部右侍郎，奉詔陳政事得失。十三年，遷兵部尚書，奉敕督賑順天府等處。⁶⁸梁清標仕途順遂，常列於世祖左右，故其在順治年間的詩作，白胤謙稱之「和其氣，正其性，稱德而盡志，非如北地所詬雕刻玩弄，情

⁶⁰ 《大清世祖章（順治）皇帝實錄》，卷 66，頁 15，收入《大清歷朝實錄》（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8），第 8 冊，頁 774。

⁶¹ 序末有「順治庚子夏長至之日太原白胤謙」。梁清標：《蕉林詩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同註 47，集部，別集，第 204 冊，頁 5。

⁶² 《大清世祖章（順治）皇帝實錄》，卷 68，頁 25、29，收入《大清歷朝實錄》，同註 60，第 8 冊，頁 803、805。

⁶³ 同註 60，第 8 冊，頁 805。

⁶⁴ 同註 60，第 8 冊，頁 1080。

⁶⁵ 同註 60，第 8 冊，頁 1080。

⁶⁶ 戴明說《定園文集》由王鐸鑒定，王鐸卒於順治九年，故〈李坦園先生序〉一文所稱之「皇帝」當為世祖順治。〔清〕戴明說：《定園文集》，頁 12，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影印康熙平山在東閣刻本，1997），第七輯，第 18 冊。

⁶⁷ 魏裔介〈張素存內翰詩草序〉，〔清〕魏裔介著、魏連科點校：《兼濟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上冊，卷之 5，頁 112。

⁶⁸ 梁清標生平，詳見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同註 11，卷 79〈貳臣傳乙〉，頁 6584-6585。

寡而辭多者。」⁶⁹換言之，直隸真定梁清標，稟持北地氣性正和、稱德盡志的詩風，恰好與意圖振興文教，考訂雅音的聖意若合符節。有意思的是，與梁清標同科進士的王崇簡，自順治十三年後，心境趨向平和，紀頌之作漸多，詩風亦轉向「盛世之音」的特點，如〈順治十二年仲春上駐驛南苑，閱武行搜禮，召廷臣四品以上同詞臣恭視，賜宴行宮，命賦五七言律五七言絕句各一首應制〉十首。⁷⁰凡此顯示新王朝須要與之相應的治世之音，自然地，傳統詩教的實用功能被採納，提供建構盛世政治的依據。

清初的詩學論述，就在與政治現實的交纏狀況下持續進行，「真詩」此一核心價值的辨析亦然：

竊嘗論之六經，皆古人自抒其所得之作，而詩三百篇尤為性情之書。……明李、何、王、李倡為雄麗高華之什，後學轉相摹倣，如衣冠飾土偶而貌具存，意味索然，於風雅一道何居？此襲之為痼疾也。（薛所蘊〈曹峨雪詩序〉）⁷¹

滿懷亡國悲怒的遺民詩人，既無法寫出溫柔敦厚的雅正詩句，更不願迎合大清的文治雅音，遂而推出「真」為更高準則，意圖打通詩論之「正變」界限。如杜濬（1611-1687）：「夫真者，必歸于正，故曰正風正雅，又曰變而不失其正」。詩於是可嗔、可怒，只要發乎真性情，仍屬「正風正雅」。⁷²仕清文人同樣推崇真詩，但其出發點與遺民文人不同，目的之一在於反對明代「轉相摹倣」的模擬作風。批評明代詩歌的流弊，乃為清初詩學的主流話語之一，⁷³然而薛所蘊並不怪罪李夢陽、何景明、王世貞、李攀龍等人，而將禍首指向其後學，顯見薛所蘊仍是肯定前、後七子所倡導之雄麗高華，以為這樣的詩作方是風雅一道。相反地，轉相摹倣的後學所作，徒具形貌而意味索然，也就是並非抒其性情的真實詩作，不足稱之「風雅」。仕清文人以真切，真性情糾舉明代的模擬痼疾，遂云，「詩之真者，原本性情，自出機杼，不屑屑捫摭剽竊為工；偽者反是。故性情正而天下真詩出。」⁷⁴當仕清文人把性情之真納入雅正詩教，就與遺民詩人所謂可嗔、可怒才是「真詩」產生了歧異。

⁶⁹ 白胤謙〈蕉林詩集序〉，《蕉林詩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同註47，集部，別集，第204冊，頁5。

⁷⁰ 王崇簡詩風亦轉向盛世之音，詳參劉麗：〈王崇簡其人其詩〉，《閩江學刊》第3期（2009），頁128-129。

⁷¹ 《澹友軒文集》，卷之3，頁8-9，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同註29，第15冊，頁44。

⁷² 遺民中以杜濬和閻爾梅二人論述較多，主張最力的二位詩人，詳見嚴迪昌：《清詩史》，同註5，頁75-83、123-134。

⁷³ 蔣寅：〈清初詩學的主流話語〉，蔣寅：《清代詩學史（第一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頁78-91。

⁷⁴ 「魏裔介與梁清標論詩」，見徐世昌：《晚清詩話匯詩話》，卷23，同註42，頁108。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作者性情敦厚雅正，詩篇自會醇雅溫潤，讀者受其感動，亦趨之風雅性情，此乃儒家詩教的理想境地。此外，作者是否出於性情，創作為真詩，還涉及人品問題。這在世變之際顯得尤其重要，詩學辨析還是與政治現實脫不了干係：

古人之詩出於性情，故所居之地，所處之時，所與之人，所行之事，所歷之境，所見之物，至今一展卷了然者，真詩也。若今之人，亦曰性情物耳，然而不真者頗多。即如極富而言貧，極壯而言老，極醒而言醉，極巧而言拙，失其真矣。且功名之士，故發泉石之音；狂悖之徒，飾為忠孝之句，尤不真之甚者也。學者宜以真詩為法哉。（魏象樞〈庸言〉）⁷⁵

基於「出於性情」的本質認定，山西蔚州魏象樞（1617-1687）認為詩歌理就應該如實呈現作者所面對的地、時、人、事、境與物，極富而言富，極壯而言壯，真詩就是詩人真性情的流露。魏象樞此論，在清初詩學語境中並不特殊。但他由此痛斥時人創作失真，分明是追求功名之士，卻寫下皓潔淡泊之言；舉止放誕，違背情理之徒，又以忠孝詩句作為掩飾，前者似論仕清之人，後者若云遺民狂狷者。總之，均從詩之性情觸及作者身分，真詩是詩人真性情，真身分的自然流露，作者身分成為辨別「真詩」與否的準則之一，⁷⁶反映出清初特重作者身分的現象，於是詩人是清臣，或遺民的身分尤須嚴分。

清初肯定詩歌的變風價值，「溫柔敦厚」的詩教論述也呈現多種意涵，最明顯的是從辭令風格切換到性情表述。⁷⁷薛所蘊評周亮工之詩：「不但無政事金革氣，並悲歌感慨之意而無之……溫柔敦厚，詩教也。」⁷⁸、王崇簡，「詩者，持人性情，性情所至，賦若直質而比興之音更多婉篤，情之不能陳，必有所託而深焉，此風人之蘊藉厚而流志遠也。」⁷⁹總體而言，北籍仕清文人大多依循詩教傳統，特重性情敦厚醇雅的真詩，於此不再贅述。從詩學發展來看，北籍仕清文人提倡風雅詩教，缺乏開創性，沒有受到重視實屬必然。然而復歸雅正的平和之音，卻呼應新王朝建構太平的文治內容，此或是明末王鐸等人宗法七子，倡導醇雅詩道時，始料未及的政局發展。

⁷⁵ [清]魏象樞著、崔凡芝校點：《寒松堂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頁75。

⁷⁶ 蔣寅以為「將這種由作者身分帶來的規定性也視為文體的一個部分，不能不說是清初對於『真詩』加以深思而派生的理論成果。」蔣寅：〈在傳統的闡釋與重構中展開—清初詩學基本觀念的確立〉，《中國社會科學》第6期（2006），頁167。

⁷⁷ 詳見蔣寅：〈在傳統的闡釋與重構中展開—清初詩學基本觀念的確立〉，同上註，頁161。

⁷⁸ 王鐸，《擬山園選集》，同註22，第15冊，頁46。

⁷⁹ 王崇簡〈毛錢子詩序〉，《青箱堂文集》，卷4，頁23，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同註45，第16冊，頁12。

四、書寫、際遇與世運

從晚明到清初，北籍仕清文人抱持一貫的詩學立場，崇尚性情雅正的詩篇，既表達對公安、竟陵詩風之不滿，又提供新王朝文治教化的內涵。但世變之後的順治年間，政局仍然動盪，社會亦未安定，身處其間，怎能呈現風雅之音，乃為北籍仕清文人必須回應的追問，而此回應也是其思索自身處境的必經歷程。不消說伴君如伴虎，仕官異族，面臨的順逆得喪，榮辱是非只怕更多於其他朝代，何能無怨尤嗾殺之聲？據薛所蘊的說法：

夫人苟非內足於己，其於境遇之順逆得喪，榮辱是非，遑遑隨之遷移而喜怒哀樂之情動於中者，遂茫然莫能自主。喜怒哀樂不能自主而發於外者，因之悲懼無定，歌哭由人，怨尤之意深而疾首蹙額嗾殺之音以形。……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賦歸去來至乞食於人，可謂極窮人之致。而神韻蕭散，發為聲歌，超然自遠，迄今讀其辭，想見其胸次何曠達而多適也，內有以自足而境遇不能移於詩乎。（薛所蘊〈孫孝思歸來集敘〉）⁸⁰

順治年間活躍於京師詩壇的三大家，仕清後的處境並不順遂，下場亦多淒涼。既然仕途不順，詩歌何能展現中和雅正之音？薛所蘊以極窮之致的陶淵明為典範，得出「內有以自足而境遇不能移於詩」之論。只要胸次曠達，內在自足，情志就不會被際境順逆，得失榮辱所控操，發抒於詩，超然自遠，沒有疾首蹙額嗾殺的怨尤之音。薛所蘊在文學作品與作者性情之間，安放了主體的自我調適，以保證詩篇的風雅蘊藉。揆諸現存薛所蘊之《桴菴詩》，王鐸與四川井研胡世安（?-1663）均指出其詩「合風合雅」、「不本溫柔敦厚之教」的特色：

行塢，予裏戚，湛于經濟，與談詩約三十年，中間世局傾洞，兵戈寇盜，星蝕日赤，山坼河涸，狼虎在牢，崩奔駭怪，于是乎極而變矣。予評其詩，律體修潔，七古有度。即以七古論，窺其雅步亮節，時挾風霆之氣，又似水石砰訇。風沙翳肆，金刀鏃馬。出沒荒榛斷崖之間，時而老健陡峙，時而覆五嶽翻滄海……何以馴臻此境歟，得非其經歷嶮崎，凡鬱于心，發于魂……憂國軫民，合風合雅……即此是詩，即此是經濟。詩文得山川之助，既多讀書，又得磨礱

⁸⁰ [清]薛所蘊：《澹友軒文集》，同註29，第15冊，頁51-52。

于世局之變。(王鐸〈桴菴詩敘〉)⁸¹

若擬議而景會，或俛仰而感存，或流連若願為，或疏曠翻中結，莫不本溫柔敦厚之教而言志。(胡世安〈桴菴詩敘〉)⁸²

王鐸與薛所蘊皆為河南孟津人，故其以二人的「裏戚」關係，以及長達三十載的交往來強調自己闡釋的可信度。首先，王鐸總論薛所蘊論詩精於經濟的特點，並且說明三十載的山坵河涸，世局傾崩，使得薛所蘊之詩「極而變乎」。接著，王鐸提舉薛所蘊的七言古體為證，評說其詩極變後之境，兼具雅亮、風霆、老健、陡峙、翻覆等不同風格。最後，再次申明，造就薛所蘊七古極而變乎的原因，兼得之山川、讀書與世變所助。

比對薛所蘊《桴菴詩》，卷之二「七言古」，收有〈蒼蠅嘆〉、〈墾荒詞〉、〈行旅曲〉、〈門夫謠三章〉、〈富兒歌〉、〈老農歎〉、〈賈客曲〉、〈古窑行〉、〈從軍曲〉、〈驛卒詞〉等反映戰亂流離，生民疾苦的大量詩篇。另如〈蒼梧雲行〉、〈猛雨行〉、〈馬不進行〉、〈觀兵行和憲石〉、〈擬四愁〉、〈去矣行〉，雖寫自身悲感，卻帶出世變蹇困難行的實況。⁸³因為是自己親歷，薛所蘊寫來情真生動，濤湧跌宕，所以王鐸讚其七古乃「得磨琢于世局之變」。薛所蘊的七古再現了世變下的蒼生實況，王鐸說是「即此是詩，即此是經濟」。而這正是薛所蘊自明入清，一向「談于詩，湛于經濟」，「憂國軫民」的詩教用心。值得注意的是，薛所蘊歷經「世局傾洞，兵戈冠盜，星蝕日赤，山坵河涸，狼虎在牢，崩奔駭怪」的世變，詩風亦隨之多變，但他並沒有像清初遺民群體一樣，轉向嗔怒變雅，反而作詩「合風合雅」、「莫不本溫柔敦厚之教而言志」，論詩也力主雅正平和，倡導風雅詩教，可見薛所蘊遵守自己所提出的主張，由我控制情志，不受到世變際遇的牽制。

循此，如何呈現世變中的際遇、情志，實為書寫主體可以自為主宰。薛所蘊強調詩人胸次曠達，內在自足。王崇簡則提出多讀書、養氣方法來確保「胸中確有所見，不為境遇所移」：

丈夫處世進退，自有其據，進而為世用也……世苟舍我而退也……士君子之得志，固不在顯晦之分，若進而利祿是艷，豈為得志，退而靜正以守，豈為不得

⁸¹ 《桴菴詩》，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4冊，同註25，頁639-640。另王鐸有〈行屋薛公桴軒集序〉一文，見《擬山園選集》，卷37，頁10，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同註15，頁546。

⁸² 李聖華：《晚明詩歌研究》，同註19，第14冊，頁638。

⁸³ 蔣寅：〈在傳統的闡釋與重構中展開—清初詩學基本觀念的確立〉，同註77，第14冊，頁675-710。

志。(王崇簡〈秋吟序〉)⁸⁴

予尤以為讀書多，養氣厚，胸中確有所見，不為境遇所移，即縱目騁懷，未必不得江山之助，而卓然性情之旨。即歷顯晦得喪之不一，皆不失詩人風諭之義。

(王崇簡〈許鶴沙詩序〉)⁸⁵

王崇簡認為，一個人若讀書多，又經山川經歷的淬鍊，就會自有定見，無論境遇若何變化，詩人性情卓然獨立，詩作也不會喪失風諭之義。

王崇簡，崇禎十六年舉進士，未及授官，李自成陷北京，攜家眷卷流寓南方。順治三年，補選庶吉士，授秘書院檢討，歷國子監祭酒、禮部尚書。⁸⁶相較劉正宗、薛所蘊，王崇簡入清後仕宦平順，善終歸老，因此對於進退處世、得志與否產生了不同看法。一般認定，為世所用是得志，不被世用為不得志。王崇簡在此進行翻轉，用與不用是外在的客觀現實，非個人所掌控，不足以作為一己得志與否的判準。反之，不戀利祿、靜居守正的性情才是人可自我作主，才足以評斷我得志與否。因此，進不為利祿所誘，退能靜正以守，即為得志；進以利祿是艷，退仍騷動不已，就是不得志。既然得志與否取決於個人性情，並非境遇，王崇簡所以要人「讀書多，養氣厚」，胸中自據見地，如此一來，便不為境遇所移，歷經任何顯晦得喪，皆不失詩人風諭之義。王氏此論可用來解釋，何以薛所蘊身歷世變傾覆，詩風仍然「合風合雅」，因為王鐸說他「既多讀書，又得磨琢于世局之變。」多讀書，胸中曠達而有定見，情志擺脫了際境的操弄，是以薛所蘊能保有「雅步亮節」、「不本溫柔敦厚」的性情、詩情。

析論個人不必為境遇所困，可以自我作主情志，乃至合風合雅，是北籍仕清文人思索處境的出路。無論是仕途較為順遂的王崇簡，或仕清遭到彈劾而引退的薛所蘊，都展現遵從詩教傳統的立場。此外，風雅正變與時代盛衰的關係也是張縉彥等人關注的議題：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今樂府度曲詩也。三百篇四言耳，蘇、李變五言，柏梁七言……況又變而宋元無慮數百十家而雅道不可復識矣……盟津王先生富于六義，脫稿數百卷……咸知尊雅云，此又其變之大者與。閔子審今茂年好學，經亂離後游河朔，跡蘄黃，觀洞庭，望雲湘。悲風怨氣，聚結為志，揚播為聲，

⁸⁴ [清]王崇簡：《青箱堂文集》，同註45，第16冊，頁18。

⁸⁵ [清]王崇簡：《青箱堂文集》，同註45，同註45，第16冊，頁23。

⁸⁶ 依王崇簡自撰年譜，其於順治三年，經順天學政曹溶薦，補選庶吉士，授秘書院檢討，後遷國子監祭酒。九年，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十三年，補詹事府少詹事兼弘文院侍講學士。十五年，陞禮部尚書。順治十七年，議覆北嶽於渾源，世祖採之。[清]王崇簡〈王崇簡年譜〉，見《青箱堂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同註45，第16冊，頁199-204。

殆觀變之熟者乎。《變雅一集》皆辛巳，壬午間所著歌行。白居易曰，臨事而發者謂之感傷，有事則志形，有志則聲作，感傷者，志之至變者也。志變而詩因以變，故正者有變也，變者有正也。（張縉彥〈閩審今變雅題辭〉）⁸⁷

閩（閩）審今為何人，尚待進一步詳考。然而除了張縉彥，薛所蘊也有〈閩審今詩序〉一文，其中曰：「吾里閩審今詩，覺斯前輩既與以創，以興，以老矣。」⁸⁸可知閩審今亦為河南孟津人，與王鐸、薛所蘊、張縉彥等人熟識。

「辛巳」，崇禎十四年，「壬午」為崇禎十五年。此時的明王朝，戰禍頻仍，氣數幾盡，閩審今目睹河朔、蘄黃、洞庭、雲湘等河山實況，免不了觸發悲風怨氣之志。特別的是，張縉彥似乎有意削減閩審今詩的悲怨力道，採以白居易「觸事而發，謂之感傷」來詮解其詩。時代亂離，詩人的情志是悲怨，志形而聲作的至變之詩卻只有「感傷」。白居易在中唐時力主復興風雅詩教，張縉彥取其感傷說來闡釋閩審今詩之變，顯然是呼應王鐸，「尊雅云，此又其變之大者與」。換言之，至變的詩篇依然不脫雅正之道，「正者有變也，變者有正也」。這也是張縉彥的門人陝西三原韓聖秋（？-1662）在〈閩審今變雅題辭〉卷末的評曰：「四始六義正變兼存，古人之變，不離乎正者」。⁸⁹

〈毛詩序〉：「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至於王道衰，禮樂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雅作矣。」⁹⁰歷代凡論風雅正變，大都聯結時代盛衰。王崇簡卻不循舊說：

詩之貴體格也，尚矣，非惟風雅頌各有其體，即風雅之正變亦以其體言也。體之合乎正者，雖衰時不無溫厚之章，體之出乎正者，即盛世不無怨則之什，是正變各以體言，非以其時之衰而為變，世之盛而為正也。……予嘗讀雲間吳六益《清平集》，其調高，其聲堅，雖有溫厚怨刺之異，而皆洋洋乎以體格勝者也。（王崇簡〈吳六益詩序〉）⁹¹

詩者，莫要乎辨體。正者，體合乎正，變者，體屬乎變。正變各以體言，非以

⁸⁷ [清]張縉彥：《依水園文集後集》，卷2，頁1-2，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同註51，第13冊，頁147-148。

⁸⁸ [清]薛所蘊：《澹友軒文集》，卷之4，頁6，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同註29，第15冊，頁53。

⁸⁹ [清]張縉彥：《依水園文集後集》，卷2，頁2，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同註51，第13冊，頁148。

⁹⁰ 《詩經注疏》，《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270-271。

⁹¹ [清]王崇簡：《青箱堂文集》，卷4，頁15，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同註45，第17冊，頁8。

世之隆變而污也。……以時之盛衰論正變，既不識體之正，又何有于體之變乎。竊嘗揆之論正變以體，未若論正變以聲。況體原由聲而定也。……蓋詩之本在于聲……詩者，聲乃詩之本也……或又以聲何以有正變，宮商角徵羽，正也，所謂變宮、變徵者，非變乎。先王化成天下，莫先于詩，其效至于協神人，和上下，蓋聲音之道與天地通，其用大矣。……論正變者，惟取時之盛衰，詞之美刺已爾！今以聲辨正變，無乃好為異論乎。（王崇簡〈風雅正變論〉）⁹²

吳懋謙，字六益，江蘇華亭人，王崇簡藉由評說其詩，標舉詩之體格的重要性，進而提出詩歌的風雅正變應該就詩的體格論而非時代盛衰。因此，「體之合乎正者，雖衰時不無溫厚之章，體之出乎正者，即盛世不無怨則之什」。

王崇簡就詩歌本身來論風雅正變，使得詩風不再與世風糾纏不清，在詩學論述上饒具深意。〈風雅正變論〉一文，王崇簡再次申述，詩的「正變各以體言，非以世之隆變」、「以時之盛衰論正變，既不識體之正，又何有于體之變」，同時進一步推出「論正變以體，未若論正變以聲」的辨體依據。對王崇簡來說，詩之本在于聲、聲乃詩之本，宮商角徵羽之正是為詩之正，變宮、變徵者則為詩之變。甚至，詩歌之所以能助上位者化成天下，就在其以聲音之道與天地通，具有「協神人，和上下」的效用。王崇簡先從聲音論正變，強調詩歌藝術審美的自主性，再由聲音論及詩歌功用，使詩具有時代社會意義。如此一來，雅正之詩依然兼具詩歌體格的審美意義以及化成天下的政教功能，王崇簡的論述並沒有背離風雅詩教傳統，然而詩歌正變已不再是時代盛衰的附庸。基於此，王崇簡並不在乎吳六益詩中反映時代盛衰的美刺之詞，而是肯定其聲調高堅的體格——「雖有溫厚怨刺之異，而皆洋洋乎以體格勝者也」。

北籍仕清文人，一方面以書寫主體為重心，強調作者若能多讀書，胸次曠達，內在自足，即可扭轉時代盛衰的操控，於詩中展現雅正平和之聲。另一方面就詩之體格、聲音而論，詩歌本身方為風雅正變的關鍵，詩風與世風自此脫鉤。而無論從書寫主體或詩體本身，北籍仕清文人論詩總不離雅道，作詩必須合乎溫柔敦厚之教。

五、結語

從晚明到清初，北籍仕清文人抱持宗法七子，崇尚醇雅敦厚的詩學主張，力矯公安、

⁹² [清]王崇簡：《青箱堂文集》，卷6，頁28-29，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同註45，第17冊，頁60。

竟陵以降側艷、浮薄的纖仄詩風，在京師詩壇持續倡導合乎性情之正，復歸詩教風雅方為真詩。此種崇尚醇雅敦厚的詩教傳統，向來被認為與世運盛衰休戚相關。然則，晚明朝政頹腐，社會動盪，緊隨而來是天崩地坼的世變亂離，身歷其間，文人如何確保自我的雅正詩風。薛所蘊等人提出自我主宰性情的方法，時代際遇雖然無法選擇，但可以透過讀書、養氣，使自己曠達自適，不失溫柔敦厚的雅正性情與詩情。甚至，王崇簡認為詩教風雅與時代盛衰無關，回歸詩歌本身，宮商角徵羽之聲，才是決定體格正變的關鍵，且使詩歌保有政治社會功用。

從詩學發展來看，在京師的北籍仕清文人主張詩教風雅，開創性極為有限，但呼應新王朝意圖開創盛世的文治要求。正如梁雲構（1584-1649）所云，「詩者，休明之鼓吹也。今聖上在上取竹嶠谷，則律緹管，有志乎盛世之音，故天下之詩先肇之。」⁹³尤其王鐸等人也都肯定詩教雅正的政教功能，於京師倡導察風俗、審王化，考辟政教得失之詩用觀點。

依據白一瑾的分析，以王崇簡、梁清標為代表的第三梯次貳臣群體，變雅之詩少，廟堂大雅風範更為純粹。在清初京城詩壇轉向王漁洋所代表的純正廟堂詩風的轉變和過渡中，居於重要的地位和作用。⁹⁴然而，若不是王鐸、劉正宗、薛所蘊等人，在順治年間的京師詩界持續倡導雅正詩風，較他們年輕的王、梁諸人，只怕影響力有限。而後，康熙初期的京師盛行宋詩，以唐詩為宗的醇雅詩風沈寂一時，須待北人，山東新城王漁洋倡導「神韻」，登上詩壇盟主，屬於大清的醇雅盛音終告成型。考察王漁洋與清初山東詩人群，蔣寅注意到「趙進美詩學觀可能對王漁洋產生過一定影響。」⁹⁵趙進美，字嶷叔，山東益都人，崇禎十三年（1640）年進士，入清授太常寺博士，歷任福建按察使。蔣寅以為，李攀龍所象徵的唐詩傳統仍是清初山東詩家的典範，雖然他們在創作上又以杜詩為宗。但趙進美則代表著另一種詩學趣向，因為他曾說，自己論詩，於宋得嚴羽，明得徐禎卿（1479-1511）、王世貞（1526-1570），這和王漁洋論詩的家數完全一致。⁹⁶

趙進美這段話出自其《清止閣集·自序》，時間在戊戌孟夏，也就是順治十五年的夏天。⁹⁷此前，趙進美在京城和北籍仕清文人時有往來，他曾陪王鐸出遊，尊稱劉正宗為老師，送薛所蘊返鄉探親，與王崇簡賞游宴飲，⁹⁸對於以上諸位的詩歌主張應該有所理解。

⁹³ 梁雲構〈醉月館詩序〉，見〔清〕梁雲構：《豹陵集》，卷15，頁2，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清順治十八年梁羽明刻後印本），第17冊，頁370。

⁹⁴ 白一瑾，《清初貳臣士人心態與文學研究》，同註3，頁418-419。

⁹⁵ 蔣寅：《清代詩學史（第一卷）》，同註73，第六章第一節〈王漁洋與清初山東詩人群〉，頁610。

⁹⁶ 蔣寅：《清代詩學史（第一卷）》，同註73，頁610。又王小舒與蔣寅看法相同，其云：「趙進美和王士，從創作到理論，就存在著一種前後交接的關係，這種交接是在順治後至康熙初完成的，正代表了山左詩風風氣的轉移。」王小舒：《廈門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1期（2012），頁63。

⁹⁷ 〈清止閣集·自序〉：「趙子曰：『蓋予嘗取古今論詩之合者，於宋得嚴滄明，明得徐昌穀、王元美。』」〔清〕趙進美：《清止閣集》，收入《山東文獻集成》，同註53，第2輯，第29冊，頁490。

⁹⁸ 參見趙進美〈夏日同黃玉叔，陪王覺斯先生遊崇教寺〉、〈初夏雜感，同王敬哉、馮孔博、宋玉叔、

而從〈韓岱輿詩序〉：「明嘉靖間馳譽風雅……諸子所推服而兄事之者，莫先于鱗氏。于鱗氏之稱詩也，兼北地信陽之盛而加以高華……使海內操觚之士循循步趨而不敢爭先。」⁹⁹的論述看來，徐昌穀、王元美之外，趙進美似也贊揚北地鄉里的詩學傳統，推服李攀龍。趙進美侄孫趙執信（1662-1744）就說：「初，公童年為詩，頗好華艷，登第後，詩友漸摩，遂踐信陽、歷下之庭。」¹⁰⁰王漁洋與趙進美為姻親，二人時有互動，王漁洋更為趙進美撰寫墓誌銘。¹⁰¹透過趙進美，我們確實可以詳探王漁洋詩觀與順治年間京師詩風的可能關聯，進而思考順治年間北籍仕清文人所倡導的雅正之音和康熙時期京師崇尚醇雅詩風的異同。特別是康熙年間，和王漁洋唱和密切的山東安邱曹貞吉（1634-1698），自幼隨其外祖父，順治京師三大家之一的劉正宗學詩。

必須強調，清初京師詩壇並非僅存盛世之音，哀歎世變亂離仍大有人在。與王鐸、劉正宗、薛所蘊過從甚密山東諸城丁耀亢（1599-1669）即為其一，其詩激楚亢厲，時露不遇悲感。而這種多元音響，同時也是清初詩風的實況，大批遺民文人仍處於亡國嗔怒的情志之中。甚至，正因為另存綺靡淫佻，憤激悠謬的詩風，在京的朝臣才必須積極倡導醇雅詩教，釐正風氣。¹⁰²此外，北籍仕清文人之間，在政治立場上存有嚴重歧見，互為不滿。順治年間不斷上疏彈劾北黨首魁的正是魏裔介。此或涉及老臣漢官與新科進士之間，複雜的政治角力，雖非本文關注焦點，均有待梳理之。

轅文作〉、〈劉憲石老師新築初成〉四首、〈王敬哉招飲談舊醉歌〉、〈送薛行鳩少宗伯歸省薛奉特旨定限還朝〉，〔清〕趙進美：《清止閣集·燕市草》，收入《山東文獻集成》，同註53，第2輯，第29冊，頁593、603、605、607、612。

⁹⁹〔清〕趙執信：《飴山文集》，卷10，收入趙執信著，趙蔚芝、劉聿鑫點校：《趙執信全集》（濟南：齊魯書社，1993），頁610。

¹⁰⁰《清止閣集·泚正文草》，收入《山東文獻集成》，同註53，第2輯，第29冊，頁732。

¹⁰¹王漁洋〈清止公墓誌銘〉，見《清止閣集》，收入《山東文獻集成》，同註53，第2輯，第29冊，頁820。

¹⁰²魏裔介〈今詩溯迴集序〉：「今海內言詩者頗多，然綺靡淫佻之習，流蕩忘返，比于網聒蟲吟，而憤激悠謬之詞，雜出不經，亦豈驚鳴鳳嘯耶！將欲垂示來葉，釐正風氣，難已。」〔清〕魏裔介：《兼濟堂文集》，同註67，卷之5，頁105。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唐〕孔穎達疏：《詩經注疏》，《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明〕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李德龍、俞冰主編：《歷代日記叢鈔》，北京：學苑出版社，2008年，民國二十六年紹興縣修志委員會鉛印本。
- 〔清〕梁雲構：《豹陵集》，《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清順治十八年梁羽明刻後印本，第17冊。
- 〔清〕王鐸：《擬山園選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十年(1653)王鐸刻本，集部，第87冊。
- 〔清〕劉正宗：《通齋詩》，《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清順治刻本，第8輯，第16冊。
- 〔清〕張縉彥：《燕箋詩集》，《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清順治刻本，第12冊。
- ：《依水園文集後集》，《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清順治旌德劉華宇刻本，第13冊。
- 〔清〕丁耀亢撰、張清吉校點：《丁耀亢全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
- 〔清〕薛所蘊：《桴庵詩》，《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清順治刻本，第14冊。
- ：《澹友軒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清順治刻本，第15冊。
- 〔清〕王崇簡：《青箱堂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清康熙二十八年王燕重刻本，第16冊。
- 〔清〕白胤謙：《東谷集》，《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清順治刻康熙續刻雍正補刻本，第22冊。
- 〔清〕彭而述：《讀史亭文集》，《四庫全書目叢書》，台南：莊嚴出版社，河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彭始搏刻本，集部，別集，第201冊。
- 〔清〕戴明說：《定園文集》，《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康熙平山在東閣刻本，第七輯，第18冊。
- 〔清〕魏裔介著、魏連科點校：《兼濟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清〕魏象樞著、崔凡芝校點：《寒松堂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 〔清〕趙進美：《清止閣集》，《山東文獻集成》，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7年，山東

省圖書館藏清初鈔本，第2輯，第29冊。

〔清〕季六奇：《明季北略》，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清〕趙執信著，趙蔚芝、劉聿鑫點校：《趙執信全集》，濟南：齊魯書社，1993年。

〔民國〕《大清世祖章（順治）皇帝實錄》，《大清歷朝實錄》，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8年，第8冊。

〔民國〕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民國〕徐世昌：《晚清詩話匯詩話》，上海：華東大學出版社，2009年。

二、近人論著

丁功誼：《錢謙益文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王于飛：《吳梅村生平創作考論》，重慶：重慶出版社，2003年。

王成蘭：〈清初京師漢官的生活空間和關係網絡——以陳名夏和劉正宗為個案〉，《江海學刊》第6期，2007年。

王小舒：《廈門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1期，2012年。

白一瑾：《清初貳臣士人心態與文學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

——：〈北方「正統」與江南「變體」——論明七子在清初傳承的兩條主線〉，《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6卷第6期，2010年。

伍福美：《吳梅村詩歌藝術新論》，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

李聖華：《晚明詩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范秀君：〈清初「中州三大家」劉正宗、薛所蘊及王鐸交游考論〉，《蘭台世界》第2期，2013年。

馬大勇：《清初廟堂詩歌集群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

曹秀蘭：《曹溶詞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張升：《王鐸年譜》，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7年。

張永剛：《明末清初黨爭視閥下的錢謙益文學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年。

張立敏：《馮溥與康熙京師詩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

董遷：《龔芝麓年譜》，《年譜叢書》，台北：廣文書局，1971年。

劉麗：〈失路之悲，故國之思——龔鼎孳詩歌發微〉，《咸陽師範學院學報》第3期，2007年。

劉麗：〈王崇簡其人其詩〉，《閱江學刊》第3期，2009年。

蔣寅：〈在傳統的闡釋與重構中展開——清初詩學基本觀念的確立〉，《中國社會科學》第6

期，2006 年。

——：〈懺悔與淡忘：明清之際的貳臣人格〉，《徐州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 期，2012 年。

——：《清代詩學史（第一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

錢仲聯：《清詩記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 年。

謝明陽：《雲間詩派的詩學發展與流衍》，台北：大安出版社，2010 年。

魏斐德著、陳蘇鎮、薄小瑩等譯：《洪業—清朝開國史》，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5 年。

嚴迪昌：《清詩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年。

——：〈金臺風雅總詩人——龔鼎孳論〉，《語文知識》，第 1 期，2008 年。

Jing Shi Poetic Circle of a Flourishing Period during Qing Dynasty Shunzhi (1644 - 1661) — An Examination of the North Ching Official literati

Wang Xue-ling*

Abstract

During the Shunzhi Era, there were assembled a large number of the Ching official literati from the north who experienced the dynastic change. They were in a high position in the royal court, they were engaged in all kind of activities about literature and art, and had a big influence at that time. This paper is intended a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literati who treated the refinement and standard of the poetic as a doctrine. Let us discuss the subject from late Ming period, the literati from the north advocated that poetry should be pure, honest and fresh, in order to rectify the quaint and mysterious manner of poetry.

Secondly, after serving the Ching government, the literati from the North declared that the poetry should conform with “Gentle and Honest” in *The Book of Songs*(詩經) constantly, and we could call it as a real poem. Jing Shi Poetic Circle arose a flourishing age of refinement and standard during the Shunzhi era, and the concepts of gentle and honest were endowed with a new mean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literati from the north had the respect to the creators, and thought that “Orthodoxy-Variation” viewpoint of poetry should be differentiated from its style, meter and sounds of poetry and literary composition. Hence, it made the standard of the poetry without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the dynasty anymore. Regardless of from the author himself or from the style of the meter and sounds of poetry, the literati from the north can’t always depart refinement and standard of the poetry, and it should be corresponded to gentle and honest.

At last, the inauguration or a little bit confined of the fluctuation of literary pursuit of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the literati from the north was responded to the need of founding a prosperity of a dynasty in Ching dynasty, and it also manifested the association with the refined and standard manner in a poetry during the Shunzhi and Kangxi era.

Keywords: Jing Shi Poetic Circle, refinement and standard 、Orthodoxy-Variation, North Ching official literati

